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 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李建民

【内容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特别是 1992 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那么,在 1990 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同时,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关键词: 生育决策;生育意愿;生育需求

【作者简介】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天津:300071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在 1992 年政府确立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的生育率水平打破了 1980 年代中后期一直徘徊不降的局面,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并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郭志刚,2000,2004;“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0;于学军,2001,2002;王金营,2003)。1990 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比 1980 年代更加严格,在相同的计划生育政策环境中,为什么会出现生育率水平的明显差异呢?与 1980 年代相比,1990 年代是否有更多的夫妇自觉、自愿地实行了家庭计划?如果如此,何以如此?本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个人(家庭)是否进行生育决策,是否是理性生育?第二,我国个人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什么?第三,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将如何变化?

1 理性生育与生育决策

生育与计划生育是一种个人行为。在现代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这些行为已不再是“自发”或“随意”的,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虽然受到信息条件约束,只能是一种有限理性。在此,需要说明和判断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生育行为是不是一种理性决策的结果?第二,如果是一种理性的决策,那么,其决策的原则及影响决策的因素是什么?

所谓理性生育,是指在社会约束条件下具有明确目的的生育行为。人类生育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自然的生物行为,而是一种理性的社会行为,并且,人类对自己生育的控制能力越强,这种理性表现得也就越充分。因此,理性生育是基于生育决策而进行的生育。生育决策是夫妇¹在资源和制度约束下,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的一种决策。尽管我国的学者对新家庭经济分析学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存在着质疑(张友干、陈松宝,1997),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经历了 20 多年经济的迅速成长以及市场经

¹ 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存在着生育决策者与生育主体的异化。

济体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人们对生育的决策已经变得很慎重。例如,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15231人中,完全顺其自然而生育的人仅为1.3%,而说不清的人数比例也仅为1.5%。换言之,有97%的人具有明确的生育选择意愿。

生育决策的基础是夫妇对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或者是在家庭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生育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生育决策还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技术条件;二是制度条件。当人类对自身的繁衍还没有摆脱自然和生物因素的直接控制的时候,人类的生育行为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与动物的生殖行为相似。在生育控制技术供给缺乏或昂贵的条件下,即使人们具有生育理性,其理性生育因不能够得到相应的技术支持,而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其生育决策并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当人类掌握了生育控制技术,特别是廉价、有效的避孕节育技术广泛传播以后,整个情况就为之改观,甚至可以说,引发了一场人类生育革命。这场革命的本质意义是: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调节自己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生育决策问题。换言之,人类控制生育的技术是生育决策存在的前提。当然,这种决策的意义在两种情况下并不显现:第一,希望多生多育;第二,个人决策自由受到限制。1970年代以来,由于避孕技术和方法的迅速传播及廉价供给,生育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幅度下降,这种技术环境使得人们的生育决策真正具有了实际意义。目前,在我国这种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说已经非常完备。当人们可以比较自如地控制自己生育行为的时候,生育决策的条件也就成熟了。

生育决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生育制度安排。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条件下,生育制度安排可能不同,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生育制度安排。但无论怎样,只有当生育成为生育主体可以自主决策的时候,生育决策和理性生育才会成为可能。在国家或家族或其他制度代表的直接安排下,夫妇没有决策的权力,因而也就无需决策。对此,一些学者给予了更多的强调,即在国家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条件下,个人生育决策实际空间很小,因此,夫妇生育决策在我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这并不能否认个人生育决策的存在,而只能说明个人生育决策实现的制度约束。当国家政策给予个人的生育空间与个人的生育决策边际大致相同时,个人生育决策的意义就会变成首要因素。我国个人决策的自由度目前正在逐步扩大,一方面,人民对自己公民权利的认知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民对自己权利的维护也正在不断加强。如果说,过去政府的某项政策就是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底线;那么,现在人们行为的底线已经不是政策底线,而是法律底线。这表明我国计划生育的制度安排已经开始受到巨大的挑战(蔡,2001)。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从基础上动摇了计划生育政策原有的执行系统,使《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应而生。

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是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夫妇对于生育孩子收益和成本的判断,同时还表现在夫妇对于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能够做出及时的反应。因此,当我们探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时,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夫妇们的生育决策,以及影响其决策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见图1)。改革和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个人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却可能被低估了。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之所以在1990年代不升反降,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是因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如果说,1970年代和198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国家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结果;那么,在1990年代,这种行政力量的作用边际已经大幅度缩小。否则,我们将很难解释这样的矛盾:当个人的自由度扩大了,受行政力量约束放松了,而生育水平却在下降。因此,1990年代生育率结束了徘徊状态而出现了持续下降的现象,已经清楚地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国社会和经济对人们生育需求下降和个人生育自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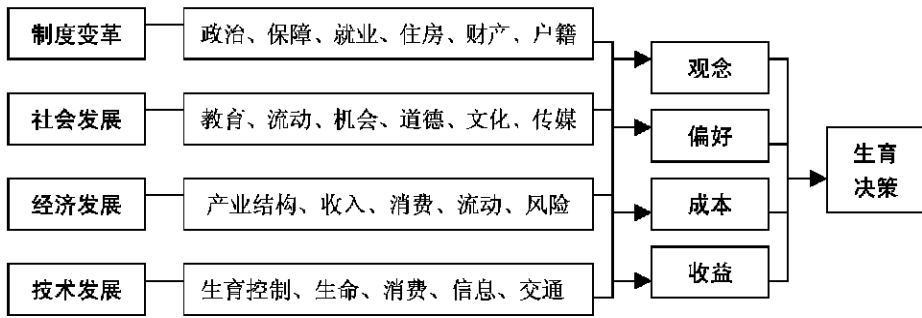


图1 个人生育决策影响因素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生育决策

2.1 家庭资源与家庭生产产品

根据家庭经济理论,生育是一种家庭生产行为,而生产行为就需要资源的投入,即我们所说的生育成本或孩子成本。但是,生育并不是家庭生产的唯一行为,孩子也不是家庭生产的唯一产品,所以家庭必需在各种家庭生产活动之间配置自己的资源,因此也就产生了决策问题,即如何配置家庭有限的资源,使家庭福利或效用实现最大化。家庭生产产品有两类:一类是孩子,另一类是其他消费品的消费效用。家庭资源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财产资源,另一类是时间资源。财产资源包括: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货币收入和其他形式的财产。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财产也是货币收入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把第一类资源抽象为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也有不同的来源,包括工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和利润收入等。由于这些收入来源的收入方式不同,它们对家庭时间资源的影响完全不同。由于工资收入需要家庭成员向市场提供劳动力供给,因此,工资收入或劳动收入是一种“时间密集型”的收入,而其他种类的货币收入则是“资本密集型”的收入。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更多地倚赖的是工资收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时间资源变得更为稀缺。而且,市场劳动力时间具有刚性,并且在家庭时间资源的分配序列中居于首位。这个性质对家庭资源的配置具有首要意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在此是: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获得货币收入,把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多地“挤”进市场,这样家庭生产的时间就会变得稀缺。

仅仅有市场经济还不是生育率下降的充分条件,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收入的提高。收入提高的直接结果是家庭生产的扩大,由于家庭生产也需要配置时间,因此家庭收入越多,家庭生产范围越大,家庭生产的时间资源也就变得更加稀缺。在这种条件下,投入孩子生产的时间就会受到其他家庭生产产品生产的竞争。人们究竟是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孩子的生产,还是更多地投入到其他家庭产品的生产,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孩子生产要素和其他家庭效用生产要素的价格,特别是这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二是偏好,由于家庭生产活动实际上是生产效用,而效用本身包含着人们心理的感受,所以家庭生产效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的偏好。人们的偏好可以划分为主动偏好和被动偏好。所谓主动偏好是指个人在无外界约束条件下的偏好,而被动偏好则是受外界约束或由外界因素引致的偏好。例如,人们对许多“地位商品”的偏好就是一种被动偏好。这两种性质的偏好在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上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主动偏好条件下,人们对某种效用的追求是持续的,并且效用边际较大。而在被动偏好的条件下,人们对某种效用的追求是受外界环境影响的,一旦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偏好可能就会立即下降,甚至消失。就孩子的生产而言,人们对孩子的偏好应该是主动偏好,但是对边际孩子而言可能就是一种被动偏好。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当导致对孩子的被动偏好的因素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就会降低。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育率出现转变现象在世界上的普遍存在,已经可以充分证明这个理论假设。

2.2 孩子的效用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家庭资源在孩子和其他效用生产之间的分配还取决于这两类家庭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那么在同样的效用水平下,这两类产品生产的时间则会因

为偏好的不同而不同。如图 2 所示, 曲线 CEG 为无差异曲线, 一个家庭生产更多的孩子和较少的其他效用可以获得与另一个家庭生产较少的孩子而生产更多的其他效用, 在这两种资源配置中, 他们所获得的总体效用是相等的; 或者说, 是无差异的。如果 E 点是均衡点, 一个人、一对夫妇或者一个家庭对孩子和其他家庭生产品都没有特别的偏好, 那么他们在这两类家庭生产品上投入的资源是相等的, 即 $C_0 = C_0$; 如果孩子有更强烈的偏好, 那么其资源配置均衡点是在 E 点上部。比如 C 点, 在资源配置上投入孩子生产的资源会更多, 即 $G_1 < C_1$; 反之, 如果对其他家庭生产品有更大的偏好, 那么, 其资源配置的均衡点将会在 E 点下部。比如 G 点, 此时 $G_2 > C_2$ 。当然, 这两类产品之间的替代只是技术前提, 关键的问题是, 任何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因此, 当一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下降时, 把资源投入到其他效用上就会使总体效用水平保持不下降。

我们在此需要回答两个问题: 其一, 孩子的边际效用是否会下降? 其二, 孩子的效用是否可以被替代? 西方关于生育率经济分析理论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认为孩子的效用包括 5 个方面: (1) 消费效用, 即孩子可以给父母带来快乐和心理的满足; (2) 收入效用, 即孩子在成长到一定年龄以后可以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 (3) 保险效用, 即孩子可以起到风险(收入风险、养老风险)防范作用; (4) 地位商品效用, 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孩子可以提高父母和家庭的社会地位; (5) 传宗接代效用, 即孩子可以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二、三、四种效用会下降。这些效用下降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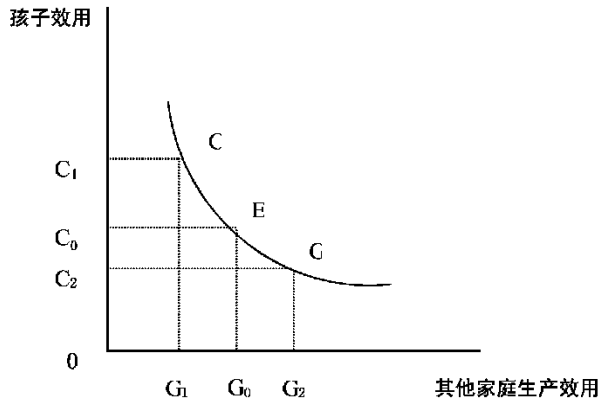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生产的两类产品效用

为边际效用的递减, 而是由于出现了更好的替代品。比如, 父母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子女的收入贡献, 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的供给比孩子具有更好的风险防范效用。孩子边际效用的下降可能更主要地是体现在孩子的消费效用。当孩子达到一定数量以后, 孩子的边际效用就会下降。而最后两种效用更多地是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关。当一个社会判别一个人或家庭社会地位更多地是以物质财富为标准的时候, 当一个社会的家族观念变得淡薄的时候, 孩子在这些方面的效用就会下降。其实, 社会和经济在两个方面影响着人们对孩子的需求, 一方面导致了孩子在上述五个方面边际效用的下降; 另一方面, 提供了取代孩子某些效用的优质或高效替代品。

由于孩子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生产产品, 其边际效用的下降有时很难做事后的判断, 只要夫妇预期孩子的边际效用下降, 他们就很可能避免生育。因为, 一旦孩子出生, 不管孩子的效用如何, 他们都必需承担起父母的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人们在生育上是更为理性的。其实, 人们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分布已经可以反映出孩子边际效用的下降。图 3 和图 4 分别显示了 1997 年中国城乡和不同类型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分布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生育意愿为一个和两个孩子的人占绝大多数。如果我们把这个不同个人的生育意愿分布看成是一个人的边际生育意愿分布, 我们还可以做出两个推论: 其一,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边际效用最大的是第二个孩子, 这意味着在第二个孩子之前, 孩子的效用是递增的, 而在第二个孩子之后, 孩子的效用是递减的; 其二, 越是发达的地区, 孩子的边际效用递减得越早, 城市的曲线要比农村的曲线扁平, 而从一类到四类地区, 曲线的形态依次变得更为陡峭。^④

¹ 1997 年国家计生委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

^④ 一类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重庆; 二类地区包括: 河北、内蒙、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和陕西; 三类地区包括: 山西、江西、湖北、广东和甘肃; 四类地区包括: 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 1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人理想子女数分布

%

调查时间	调查者或研究者	调查地区	调查对象	样本数量	意愿生育孩子数				不知道或未考虑
					0	1	2	3+	
1994	蔡洪福 (1995)	上海市	20~34 岁 独生子女	207	2.4	41.5	55.6	0.5	-
			20~34 岁 非独生子女	2365	1.6	40.2	57.7	0.3	0.1
1994	周长洪、黄丽华 (1996)	温州泰顺	农村妇女	134	-	18.66	66.42	14.93	-
1995	方箐、张开宁 王爱玲(1997)	昆明市 两城区 ^a	外来做生意和 打工已婚妇女	304	-	33.33	60.90	3.47	2.3
			外来做生意和 打工未婚妇女		-	29.97	15.74	-	54.29
1997	陈华、朱中仕 (1999)	浙江省 富阳县	50 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1051	-	14.50	72.20	13.30	-
			60 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	35.40	62.50	2.10	-
			70 年代出生育 龄妇女		-	56.80	4.90	1.00	-
1997	周长洪、徐长醒 (1998)	广西 资源县	计划生育户中 育龄夫妇	400	-	17.00 ^b	82.50 ^b	0.50 ^b	-
		浙江 温岭市			-	16.00 ^c	83.40 ^c	0.50 ^c	-
		-			-	29.30 ^b	69.70 ^b	0.90 ^b	-
1997	周长洪、黄宝凤 (2000)	全国	农村育龄妇女	11668	0.30	25.1	62.6	5.2 ^e	1.8
			城市育龄妇女	3545	1.90	42.2	51.8	2.2 ^e	0.9
1998	周建芳、张洪波 (1999)	浙江省 湖州市	放弃申请生育 二孩的农村 育龄妇女	314	-	74.00	26.00	-	-
1998 ^d	温勇等 (2000)	安徽省 宣州市	可以生二孩但 还未生育的 农村育龄妇女	467	-	28.90	71.10	-	-
1999	周长洪、张宗益、 陶勃(2000)	湖北省 宜昌市	40 岁以下独生 女母亲	2816	0.10	70.10	28.30	-	0.40
2000 ^d	徐志豪 (2000)	浙江省嵊泗 列岛渔区	20~49 岁 夫妇	744	-	73.00	27.00	-	-
			-		-	71.94 ^a	28.06 ^a	-	-
2000	陈师闯、徐丽雅 (2002)	浙江 5 个县市	城镇已婚 育龄人口	1251	0.80	56.27	41.89	1.04	-
			-		0.80 ^a	51.24 ^a	45.32 ^a	2.64 ^a	-
			农村已婚 育龄人口		3067	0.33	38.57	59.47	1.63
2001 ^d	仲长远 (2001)	北京 石景山区	20~29 岁人口	82	-	50.81	30.84	0.03	-
			40~59 岁人口	87	6.43	46.34	47.28	0.04	-
2000	龙丹珍、郑真真 (2002)	安徽省	16~40 岁外出过 的农村妇女	3186	1.41	30.10	64.84	3.66	-
			16~40 岁从未外 出过的农村妇女		-	17.99	77.65	4.36	-
		四川省	16~40 岁外出过 的农村妇女		-	39.12	60.66	0.22	-
			16~40 岁从未外 出过的农村妇女		0.36	30.59	68.69	0.36	-

注: a 没有政策限制条件下的生育意愿; b 为妻子意愿; c 为丈夫意愿; d 调查报告发表时间; e 包括选择“顺其自然”选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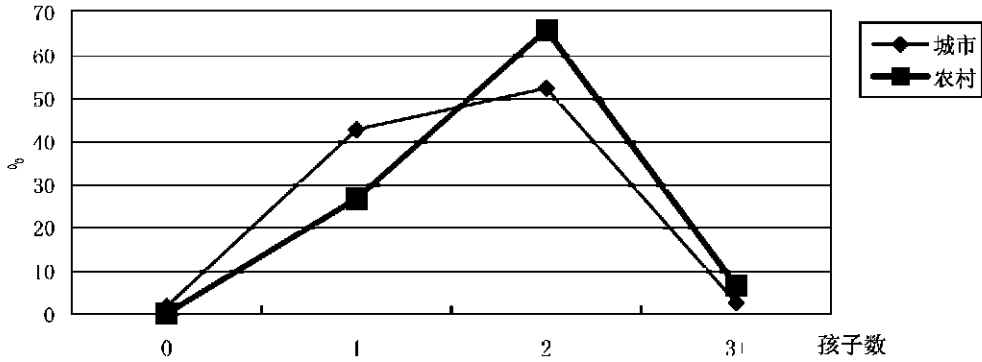


图3 1997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布

资料来源:蒋正华(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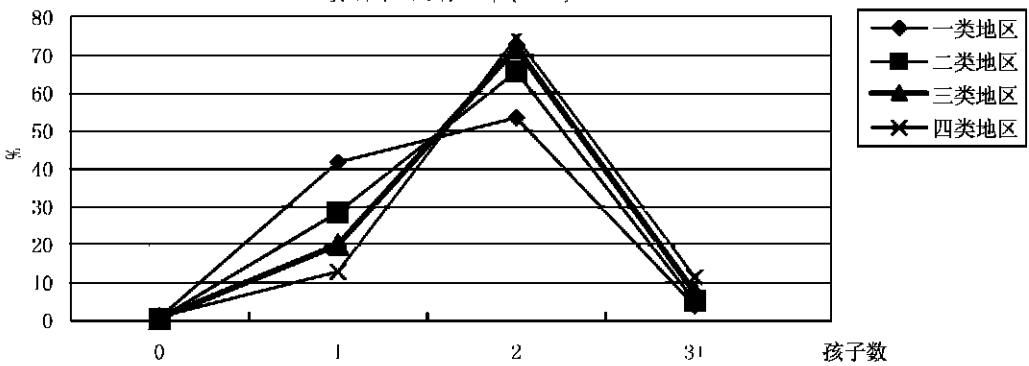


图4 1997年中国各类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分布

资料来源:蒋正华(2000)

从表2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孩子边际效用变化的趋势。在城市与其他家庭相比,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家庭中有36%的家庭认为孩子的数量还不够。这意味着对这些家庭来说,边际孩子的效用还会增加,而已经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家庭则明显达到了孩子边际最大效用,只有5.3%的家庭认为孩子的数量还不够,有将近90%的家庭认为二个孩子刚刚好。在农村,孩子效用变化的趋势与城市基本相同,从图5和图6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趋势。如果我们把图5和图6中的“刚好”分布曲线看作是孩子边际效用,把“多了”分布曲线看作是孩子的边际成本曲线的话,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推论:其一,第二个孩子是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变化的转折点;其二,第二个孩子的收益率(收益与成本之比)最高,在其之前,孩子的收益率上升,在其之后收益率迅速下降。

父母对孩子的需求可以分为情感性需求和功利性需求。前者是指父母从与孩子的情感互动和交流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后者是指孩子在劳动、收入、保障、风险防范、家庭地位等方面给父母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效用。1990年代我国学者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生育意愿的调查(方向新,1992;于淑清等,1994;朱楚珠、张友干,1996;周长洪、黄丽华,1996;赵景辉,1997;叶文振,1998;罗迈,2001),我们把有关的调查项目的主要生育目的进行了归纳,即划分为:情感需求(包括增加家庭乐趣、感情需要和增进夫妻关系)、家族需求(包括传宗接代、增强家庭势力、承续家业)、保障需求(包括养儿防老)、收入需求(包括增加家庭收入、增加劳动力)、社会义务以及其它等。这些调查反映出来的群众生育目的的总体排序情况如表3所示。

表 2 城乡不同孩子规模家庭对现有生育数量满足程度的判断

%

地区	满足程度	孩子规模				
		1 孩户	2 孩户	3 孩户	4 孩户	5 孩+ 户
城市	不够	35.9	5.3	2.0	0.5	0.0
	刚好	63.8	89.2	54.9	36.4	26.4
	多了	0.3	5.4	43.1	63.1	73.6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农村	不够	44.4	10.3	6.5	3.2	1.1
	刚好	55.1	87.3	70.4	54.0	37.2
	多了	0.3	2.2	23.1	42.8	61.7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邵夏珍(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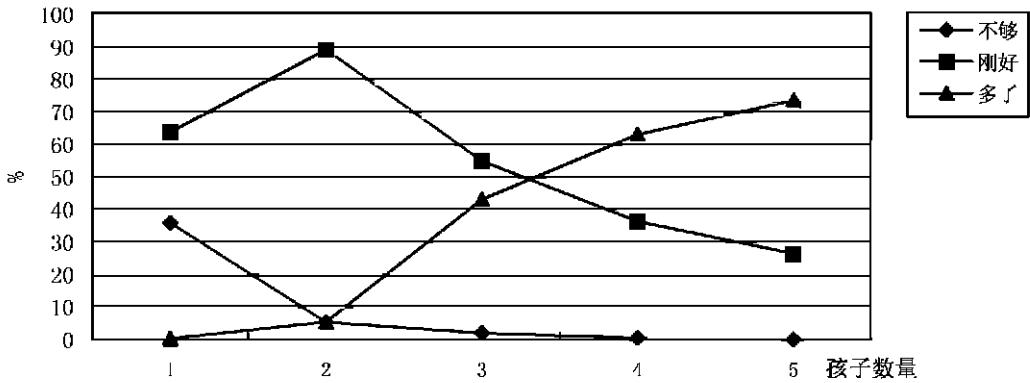


图 5 城市不同孩子规模家庭对孩子数量多少的评价分布

资料来源:蒋正华(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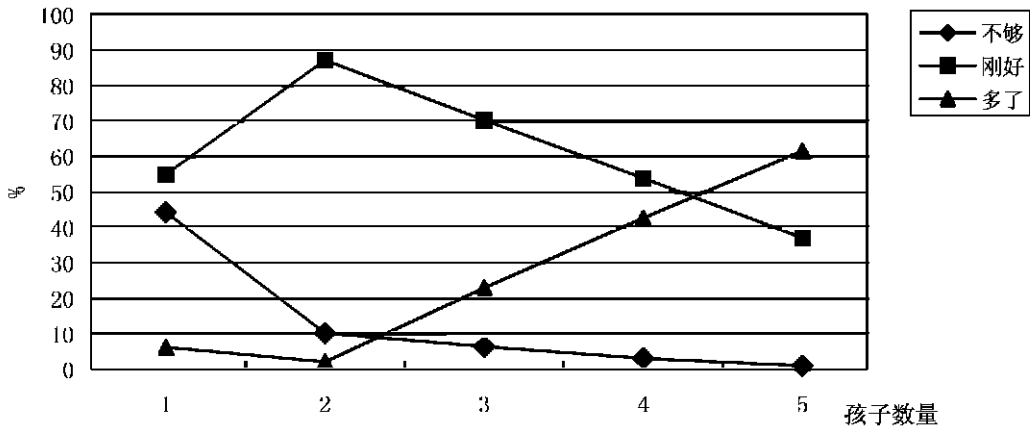


图 6 农村不同孩子规模家庭对现有孩子数量多少评判的分布

资料来源:蒋正华(2000)

可以看到,在我国的城市地区,人们生育的主要目的已经是情感需求,而收入需求很小。各项调查显示这种功利性需求百分比分布是从零(北京市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人)到 9.09%,这表明我国城市地区生育需求已经转变为现代模式,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并没有什么区别(见表 4)。但是,在我国农村还是以传统的生育需求模式为主,即生育的主要目的是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收入需求已经处于更为次要的位置。我国农民之所以把保障需求和家族需求作为生育的主要目的,关键是在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

养老保障制度,子女仍然是养老的主要资源,农村的社区人文环境使得家族势力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农村生育需求模式的转变将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社区人文环境的变化,就前者而言,应该比较容易实现,而后者则需要一个更为复杂的农村社会变化过程。

表 3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中国人生育目的分布

%

调查时间	调查者或研究者	调查地区	调查对象	样本数量	生育目的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1994	叶文振(1998)	上海市	-	-						
1994	叶文振(1998)	北京市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	-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
1994	周长洪、黄丽华(1996)	温州泰顺县	22~44岁农村妇女	134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1996	叶文振(1998)	厦门市	0~16岁孩子的父母	742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收入需求	其它需求
1996	叶文振(1998)	哈尔滨市	-	-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
1990	叶文振(1998)	湖南农村	-	-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情感需求	其它需求	-	-
1994	叶文振(1998)	温州农村	-	-	家族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	-
1996	叶文振(1998)	陕西农村	-	-	保障需求	家族需求	情感需求	收入需求	其它需求	-
1999	周长洪、张宗益、陶勃(2000)	湖北宜昌	40岁以下独生子女母亲	2816	情感需求	保障需求	社会义务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其它需求
2000	陈师闾、徐丽雅(2002)	浙江拱墅、绍兴、温岭、普陀、文成	城镇已婚育龄人口	4907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保障需求	没有特定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农村已婚育龄人口		保障需求	情感需求	家族需求	收入需求	无特定需求	其它需求
2000 ^a	仲长远(2001)	北京市	20~29岁人口	82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石景山区	40~59岁人口	87	情感需求	社会义务	保障需求	其它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2001	罗迈(2001)	绵阳农村	-	-	情感需求	保障需求	收入需求	家族需求	-	-

注: a 为报告发表时间。

资料来源:见相关的参考文献。

目前导致我国低生育水平不稳定性的直接原因,是夫妇对孩子的功利性需求。夫妇对孩子功利性需求,主要取决于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孩子功利性效用。一般来说,孩子功利性效用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反比,与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成正比。由于我国目前对孩子功利性效用的替代品(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等)供给短缺,使得父母(特别是农村地区)对孩子功利性需求仍然较高。因此,当前我国低生育率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还有相当数量的夫妇,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夫妇,对孩子功利性需求还比较大。

表 4 孩子效用的中外比较(多选)

%

地区或国家	孩子效用						
	快乐、亲情和相伴	父母自身的发展	生养孩子的满足	经济收益、保障	婚姻家庭益处	家族益处	孩子内在价值
厦门	49~83	31~78	40~71	13~29	48~83	11~43	33
台湾	88/89	10/3	9/8	6/29	14/3	20/46	6/7
韩国	69/72	39/39	54/42	12/25	25/30	15/23	5/1
日本	61/69	29/21	37/36	7/9	28/35	3/4	1/2
夏威夷							
日裔	74/84	48/55	47/43	15/22	51/33	21/18	17/17
白人	73/66	66/54	61/55	14/13	40/34	23/17	15/18

资料来源:叶文振(1998)。

2.3 孩子的成本

人们生育的决策不仅仅考虑孩子的效用,而且还考虑孩子的生产成本。在发达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因素是成本约束,在生育成本约束条件下,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可能由于孩子成本方面的原因而低于期望的生育水平。在不发达经济条件下,人们生育决策的主导是孩子效用刺激,因此,其生育水平将受孩子效用变化的影响。一般来说,孩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两个方面。直接成本包括从怀孕到孩子出生到孩子成长整个过程的全部支出(怀孕和生育相关费用、孩子的生活费用、孩子的教育费用、孩子的医疗费用);机会成本则包括夫妇由于生育和养育孩子所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所放弃的其他活动的效用。在孩子的生产成本影响因素中,收入和时间是两项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收入与时间又是互动的。当收入水平提高时,人们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就会提高,消费范围就会扩大,由于父母的利他倾向,他们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可能会以更快的比例增长。换言之,孩子消费的收入弹性大于其他家庭成员消费的收入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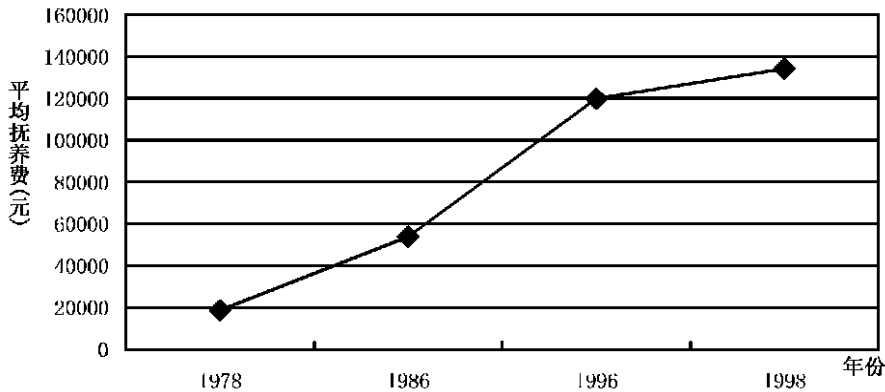


图7 城市0~16岁孩子的平均抚养费

资料来源:¹ 叶文振(1998);^④杨魁孚,陈胜利,魏津生(2000)

注:1978、1986和1996年数据分别为全国城镇、北京城镇和厦门本岛的调查数据,并按1986~1996年物价指数换算成1996年的现价。1998年数据为全国城市调查数据,并按1996年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调整。

关于我国孩子的直接成本已经有一些专门的调查和研究结果(冯立天等,1987;刘铮、段成荣,1989;朱楚珠、张有干,1996;叶文振,1998;杨魁孚等,2000)。自1978年以来,我国孩子抚养的直接成本一直呈现迅速增长之势(见图7)。1990年末,城镇平均每个孩子的每月费用支出约占家庭平均月收入的34%左右(叶文振,1998)。从目前的情况看,抚养孩子的直接成本已经成为一种约束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孩子的机会成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将会进一步开放,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投资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加剧等背景下,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孩子的成本变化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孩子的直接成本变化最为明显;在第二个阶段,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得更为重要。如果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提高了孩子的直接成本;那么,在未来对中国孩子成本影响更大的将是机会成本。这意味着机会成本将会成为限制人们生育行为的主要约束条件。

2.4 生育决策的综合决定因素

生育意愿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生育决策和实际生育行为,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例如,1965年台湾妇女理想的子女数平均为4个孩子,而实际的总和生育率为4.83,到1980年理想子女数平均为2.8个孩子(陈永山,陈碧笙主编,1990),而实际总和生育率为2.05(台湾人口统计组,1999)。在我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存在,从表5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社会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一类地区,妇女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要多于实际生育孩子数。这种差别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这些地区,孩子的成本已经成为约束生育行为的主导力量。而其它三类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理想子女数少于实际生育数,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一是妇女生育意愿与家庭生育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二是计划生育服务没有及时满足需求;三是妇女事后的判断。这种事后判断是随着父母对孩子的成本和效用的感受逐渐深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变革都十分迅速的环境下更是如此。虽然这种事后判断对于这些妇女后来的生育可能已经没有了实际影响,但她们的经验会给后来的人带来重要影响。在我们作为参照体系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的转变基本上是在一代人之内完成的,即虽然父母的生育水平高高在上,但是其子女的生育水平却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

一般来说,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而导致未实现的生育则主要是由于孩子成本的约束,即虽然一些夫妇希望有更多的孩子,但是由于抚养孩子成本等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减少生育;另一方面,实际生育水平大于生育意愿的情况更多地是发生在高生育水平条件下,其主要原因是生育控制成本太高。这种高成本的原因,包括避孕技术的不普及和价格昂贵、社会环境压力(该压力导致了控制生育的心理成本)等。因此,生育率下降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而言,这些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1) 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就业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变,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结构转变,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竞争等,可以降低孩子的效用,增加孩子的成本,进而导致生育需求和实际生育水平下降。

(2) 社会因素:城市化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在正式部门的就业水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提高,个人主义增强,传统习俗约束削弱,现代生育文化的形成等,一方面可以提高孩子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生育控制的心理成本。

(3) 技术因素:廉价、高效、低(无)负作用的避孕技术和服务的普及可以降低生育控制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进而降低实际的生育水平。

表5 已婚育龄妇女曾生子女数与期望子女数

地区	调查人数(人)	平均曾生子女数	平均期望子女数	两者差距
全国	12518	1.86	1.78	+ 0.08
一类	4943	1.57	1.64	- 0.07
二类	3850	1.93	1.81	+ 0.12
三类	2207	2.08	1.91	+ 0.17
四类	1518	2.35	2.01	+ 0.34

资料来源:蒋正华(2000)。

注:一类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重庆;二类地区包括:河北、内蒙、安徽、福建、河南、湖南和陕西;三类地区包括:山西、江西、湖北、广东和甘肃;四类地区包括: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

孩子是一种特殊的家庭生产品,除了学者们已经做出过的阐释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孩子数量的边际很小,因此,人们在做生育决策时会更加谨慎;其二,夫妇的生育意愿还取决于其相关信息的获取程度,而这种信息最准确的获得是亲身经历养育孩子的过程。因此,人们往往在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会更加谨慎。

3 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经济环境分析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我国市场经济未来生育率变动趋势的影响,更深入地认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的机理,本文在此进行国内和国际(地区)两个方面的比较。虽然所选择的比较指标主要是经济指标,但其实也可以反映出社会发展水平。

3.1 国内比较

我国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可以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的分析中得到验证。笔者计算

了1978~2000年期间我国总和生育率(TFR)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YU)、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YR)、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NU)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NR)等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相关关系。从表6可以看到,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并且,我们从它们的散点图(未显示)中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低生育率的稳定性也就越高。

表6 中国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1978~2000年)

	GDPP	YU	YR	NU	NR
TFR	-0.858	-0.873	-0.840	0.773	0.550

注:相关关系都在0.0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和总和生育率统计资料计算,其中所有收入指标都按物价指数调整为1978年的价格。

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能够进一步说明经济发展与生育率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此根据2000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有关数据,对我国生育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横截面的相关分析。由于缺乏各个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所以,我们选取了人口出生率(CBR)作为表达生育率水平的指标,但该指标受到各种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此外,我们以独生子女领证率作为反映各地区生育率水平的补充指标。为了能够更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选取了以下经济指标:(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2)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YU);(3)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YR);(4)农村居民家庭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WP);(5)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CP);(6)城市化水平(UBR);(7)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比重(IND2-3);(8)农村非农业劳动力比重(NL)。

之所以选取第4、5、8项指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出农村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分析的结果如表7所示。

由于广东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在经济上属于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生育率水平则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在排除广东省重新计算的上述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变得更为显著。

表7 200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GDPP	YU	YR	URB	IND2~3	NL	WP	CP
CBR(包括广东)	-0.676	-0.482	-0.692	-0.701	-0.775	-0.794	-0.666	-0.738
CBR(不包括广东)	-0.701	-0.567	-0.737	-0.738	-0.802	-0.801	-0.683	-0.766

注:相关关系都在0.01水平上显著。

基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人口出生率和独生子女领证率与经济各项指标之间大都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第二,与出生率关系最为显著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而是经济发展结构性指标。例如,人口出生率与城市化水平(-0.701/-0.738),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0.775/-0.802)之间的关系十分显著。

第三,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0.482/-0.567),对此可能有两个解释:一是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普遍刚性;二是城市生育率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因此,经济发展对其的影响边际已经非常小。

第四,人口出生率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例如,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劳动

力中非农业劳动力比重(-0.794/-0.801)、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0.738/-0.766)等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我国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全国人口低生育率水平的稳定将取决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2 国际(地区)比较

生育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国际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在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条件下,人口生育率水平的变化趋势。为了更具有可比性,我们选取比较参照体系的原则是:第一,生育率转变在20世纪后半叶完成的国家和地区,以保证比较时期的完整性;第二,文化环境与我国相同或相近。我们选取的参照体系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地区或属于中华民族圈,或属于儒家文化圈。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人口转变进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我们以生育率水平作为参照体系来确定比较的时间(时期)。图8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在1950~2000年期间总和生育率变化的趋势,除了日本以外,涵盖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转变的整个过程。其中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期间就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基本上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下降,并在1980年代中期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见表8)。根据这些参照体系的生育率转变完成的时间,我们选取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一些经济发展指标(见表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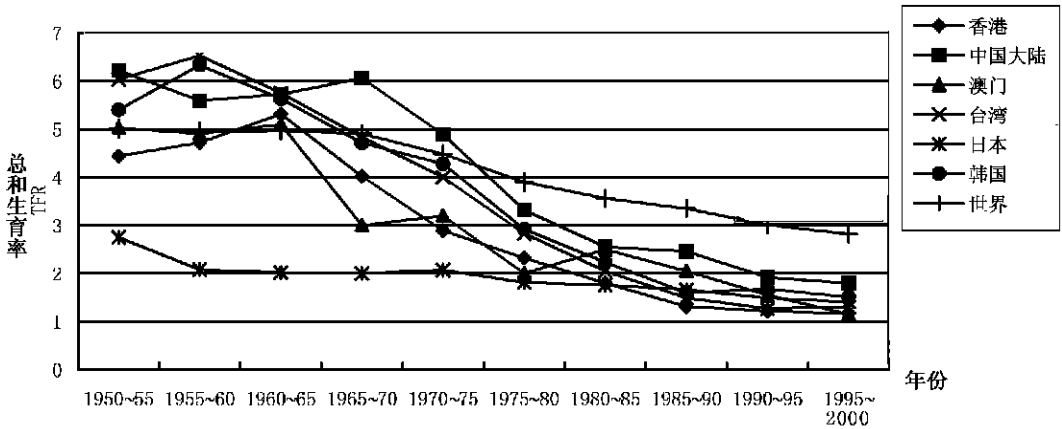


图8 世界及一些国家或地区总和生育率下降趋势

资料来源:UN(2001)。

表8 一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转变的起始和完成的时间

国家或地区	生育率开始下降的年份	TFR ≤ 2.1 的年份
日本	-	1955~ 60(2.08)
香港	1965~ 70	1980~ 85(1.80)
澳门	1965~ 70	1975~ 80(2.00)
台湾	1965	1980(2.05)
韩国	1965~ 70	1985~ 90(1.60)
新加坡	1960~ 65	1975~ 80(1.87)

资料来源:① UN(2001); ④陈永山,陈碧笙(1990)。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参照系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时,人均GDP

基本上是在 2000 美元以上, 其中只有日本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可能是由于用现价的关系), 而香港则大大高于这个水平; 从恩格尔系数看, 基本上是在 40% 左右。2000 年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水平, 全国的一些指标, 如恩格尔系数也已达到了相应的水平。从产业结构看, 2000 年我国城市(包括市辖区)劳动力的产业结构已经达到更为先进的水平。这表明, 在我国的城市地区, 生育率转变完成的经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是, 我国农村地区, 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水平还比较低, 群众对子女功利性需求也相对比较高。因此, 中西部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稳定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关键。

表 9 一些国家或地区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的经济社会指标水平

国家和地区	人均 GDP (美元)	劳动力产业结构(%)			恩格尔系数 (%)	城市化水平 (%)
		iv	⊕	⊖		
中国(2000)	850	50	22.5	27.5	42.7	36
中国城市(2000)	2340	17.05	40.73	42.22	39.2	42
香港(1980)	5628	-	-	-	-	-
台湾(1980)	2344	19.5	42.4	38.1	41.6	67
韩国(1985)	2194	-	-	-	40.3	32(1965) 72(1990)
新加(1975)	2523	-	-	-	-	-
日本(1960)	458	32.6	29.2	38.2	34.1	67(1965)

资料来源: 林富德, 沈秋骅(1980): 235~237; 高希均, 李诚(1992): 281; 世界银行 www.worldbank.org/data; 罗肇鸿(1988); 韩国统计年鉴. 1987年;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注: 在中国城市中, 人均 GDP 包括了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城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城市的数据; 产业结构只包括 15 个沿海开放城市和 4 个经济特区城市的数据。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 1970 年的数据; 我国城镇 GDP 数据是估算的。1998 年我国的 GDP 为 78018 亿元, 而同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为 36921 亿元, 占 GDP 的 47.32%, 城镇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可能会高一些, 如果该比例为 50%, 那么, 1998 年城镇的 GDP 则为 38507.8 亿元, 人均 GDP 为 101491 元, 约折合 1237 美元。

表 10 一些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情况

国家和地区	社会保障(首次立法或执行时间、历次修改时间)
香港	养老: 社会救助(1971)、全民老年和残疾津贴(1973)、需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老年补贴(1978)、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老年津贴(1988) 医疗: 社会救助(1971) 雇主责任制(1986)
台湾	养老: 社会保险制度(1950、1958) 医疗: 疾病和生育现金补助(1950、1958、1988) 健康保险(1994)
韩国	养老: 社会保险(1973) 医疗: 社会保险(1963、1994)
新加坡	养老: 中央公积金制度(1985) 医疗: 储蓄基金制度(1983)
日本	养老: 雇员年金保险(1941、1944)、国民年金保险(1959) 医疗: 健康保险(1927)、国民健康保险(1938)、国民健康保险(1958)、健康保险(1984)

资料来源: 美国社会保障署(1996)

表 11 家庭消费支出构成

%

支出项目	中国城镇 (2000年)	日本 (1996年)	韩国 (1996年)	新加坡 (1992年)
食品和饮料	39.2	16.3	28.5	18.70
衣着	10.0	5.2	7.4	7.1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8.8	5.0	4.4	8.9
医疗保健	6.3	10.8	4.4	4.6
交通和通讯	7.9	11.6	12.6	14.5
教育、休闲与娱乐	12.6	12.8	15.2	14.5
居住	10.0	23.3	7.7	10.2
其他	5.2	15.0	19.9	21.5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0: 319; 国际统计年鉴. 1999: 568

表 12 日本职工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年平均数)

%

支出项目	1970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3年
食品和饮料	34.1	31.9	29.0	27.0	25.4	24.3
衣着	9.5	9.2	7.9	7.2	7.4	6.7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0	5.0	4.3	4.3	4.0	3.7
医疗保健	2.7	2.5	2.5	2.5	2.8	2.9
交通和通讯	5.2	6.1	8.0	9.1	9.5	9.9
教育、休闲与娱乐	11.8	11.2	12.1	12.8	14.3	14.5
居住	9.3	9.4	10.4	11.1	10.3	11.3
其他	22.6	22.8	25.8	26.0	26.3	26.7

资料来源: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 1995/1996, 626; 日本统计年鉴 1995, 570~571。

表 13 台湾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

支出项目	1964年	1976年	1981年	1986年	1987年
食品和饮料	51.8	49.7	41.6	37.9	37.0
衣着	-	5.4	5.2	5.1	5.1
居住	-	21.0	22.4	23.5	23.5
医疗保健	3.8	4.7	5.2	5.5	5.5
交通和通讯	-	3.6	5.6	5.9	6.2
娱乐文化	4.7	8.9	13.1	15.1	15.6
杂项	-	6.7	6.9	7.0	7.1

资料来源: 刘建兴, 黄文真(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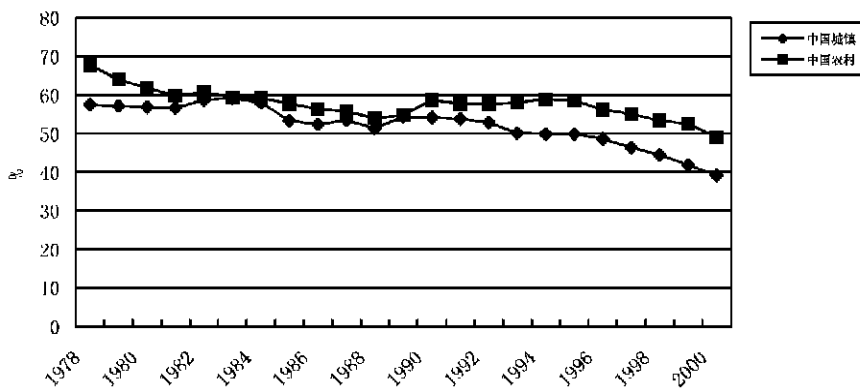


图 9 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1978~200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1. 304

4 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21 世纪初期,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会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展开,并将会对我国个人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在新的制度安排下,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居民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同时,城市居民也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这种社会变化将会进一步提高孩子的机会成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我国的市场更为开放,并导致了与人们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直接相关的经济后果,主要包括:(1)消费品市场供给价格的下降将会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使家庭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其它效用的生产,而使孩子效用生产的资源减少,其原因是其它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要大于孩子需求的价格弹性。因为,影响孩子需求的不是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孩子生产的所有投入商品的综合价格变动;因此,与其它商品的需求相比,人们影响孩子需求的商品价格的变化要滞后一些。(2)人力资本社会分层功能的强化和教育需求的迅速增长,将使孩子的成本大幅度提高。(3)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将会使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并成为孩子的主导成本。(4)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还导致了人力资本投资市场需求的迅速增长。因此,孩子数量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机制将成为影响人们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

虽然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还具有不稳定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稳定低生育的条件将会越来越成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第一,夫妇对孩子需求从功利性需求为主导向情感性需求为主导的转变。孩子功利性效用的下降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发展,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发展因素可能会比经济发展因素更为重要。孩子功利性效用能否下降,对于物质方面的功利性效用而言,关键在于这些效用能否被替代,在多大程度上被替代;对于精神方面的功利性效用而言,关键在于引致这些功利性效用的社会因素是否被削弱或消除。因此,我们的政策思路应该是:发展孩子功利性效用的替代品,降低父母对孩子功利性需求,使功利性需求的生育数量减少到情感性需求的生育数量。从政府提出的我国到 2020 年的发展目标、内容和步骤看,促进孩子功利性效用下降甚至消除的社会经济条件将会在我国全面形成。在此基础上,我国夫妇对孩子的需求从功利性需求为主导向情感性需求为主导的转变也将会实现,从而奠定了我国稳定低生育率的社会基础。

第二,夫妇生育决策模式从孩子效用刺激型向孩子成本约束型的转变。如果说过去在我国夫妇生育决策是以追求孩子效用为基本原则的话,那么现在孩子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已经成为夫妇生育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甚至可以说,在城市地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约束条件。孩子的成本之所以出现大

幅度的提高,直接原因是因生活水准提高导致的孩子抚养及教育成本的提高和收入提高导致的生育孩子机会成本的提高,这表明,西方人口学家提出的生育变动机制在我国也已经被启动。但是,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这种提高的真正原因是夫妇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一种理性反应。具体来说,就是向上社会流动的希望和向下社会流动的威胁。这种决策模式的转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表现为夫妇的意愿生育数大于实际生育孩子数。

第三,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如果上述两个转变出现并完成的话,我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稳定机制也就完成了从以国家控制为主导的政策控制机制向以群众自我约束为主导的社会控制机制转变,届时我国生育率革命也将宣告彻底完成。在我国一些地区,这种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稳定机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主导机制。从政策思路上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生育行为约束机制不要出现空白,即政策机制与社会机制两者转变的关系应该是后者进、前者退,而不是相反;否则,低生育水平潜在的不稳定性就可能会变成生育率的实际反弹。

参考文献:

- 1 郭志刚.中国近期生育水平的研究.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
- 2 郭志刚.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人口研究,2004;4
- 3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人口研究,2000;3
- 4 于学军.‘十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1;1
- 5 于学军.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总量和结构的估计.人口研究,2002;3
- 6 王金营.1990~2000年中国生育模式变动及生育水平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3;4
- 7 蔡.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理论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001;6
- 8 蔡洪福等.上海市20~34岁育龄夫妇生育意愿调查.人口与计划生育,1995;4
- 9 周长洪,黄丽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分析.人口与经济,1996;3
- 10 方箐,张开宁,王爱玲.昆明市部分女性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和避孕状况调查.人口学刊,1997;1
- 11 周长洪,徐长醒.农民生育意愿与动机及其成因的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1998;6
- 12 陈华,朱中仕.从富阳实例看浙江富裕农村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转变.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9;1
- 13 周建芳,张洪波.湖州市314名农村育龄妇女放弃申请生育二孩原因的调查.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9;1
- 14 温勇等.宣州市467名具备生育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3
- 15 徐志豪.对渔区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3
- 16 周长洪,张宗益,陶勃.农村独生子女户生育意愿与动机的变化.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0;4
- 17 仲长远.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青年研究,2001;7
- 18 陈师闯,徐丽雅.浙江省已婚育龄群众婚育观念变化调查报告.人口与经济,2002;1
- 19 尤丹珍,郑真真.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安徽、四川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2;6
- 20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0
- 21 邵夏珍.中国城乡家庭育前和育后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9;1
- 22 方向新.农村养老方式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2;2
- 23 于淑清等.市场经济与婚育意愿.人口研究,1994;1
- 24 朱楚珠,张友干.中国咸阳部分农村孩子成本与收益研究.人口与经济,1996;5
- 25 周长洪,黄丽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分析.人口与经济,1996;3
- 26 赵景辉.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人口研究,1997;3
- 27 叶文振.孩子需求论——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 28 罗迈.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调查报告——以四川省绵阳市调查为例.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5

- 29 冯立天等. 新生劳动力培养费用调查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1987; 1
- 30 刘铮, 段成荣. 人口投资与人口素质. 人口研究, 1989; 6
- 31 杨魁孚, 陈胜利, 魏津生. 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32 叶文振. 生育权利: 孩子的说法. 人口研究, 1998; 2
- 33 吴忠观, 肖立见. 中国 1971~ 1990 年计划生育投入产出效益评估研究. 人口与计划生育, 1994; 3
- 34 严军, 李树茁. 计划生育的成本—效益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西北人口, 1998; 3
- 35 严军, 李树茁. 人口控制经济效益评价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 人口与经济, 1998; 4
- 36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0
- 37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编.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 2000
- 38 陈永山, 陈碧笙主编. 中国人口·台湾分册.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 39 林富德, 沈秋骅主编. 世界人口与经济的发展.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0
- 40 刘建兴, 黄文真. 台湾经济介评. 北京: 中信出版社, 1993
- 41 高希均, 李诚主编. 台湾经济发展: 1949~ 198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2
- 42 罗肇鸿等编. 国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88
- 43 刘建兴, 黄文真. 台湾经济介评中信出版社, 1993
- 44 美国社会保障署. 全球社会保障—1995(中文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 4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 46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47 国家统计局. 国际统计年鉴 1999.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8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编委会. 世界经济文化年鉴 1995/ 1996, 1997
- 49 韩国经济企划院调查统计局. 韩国统计年鉴 1987, 1987
- 50 日本总务厅统计局编. 日本统计年鉴 1995, 1995
- 51 U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0 Revision, 2001
- 52 蒋正华主编.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集.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0

Fertility Rationale,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and Transition of Mechanisms in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in China

Abstract: Fertility transition has been very rapid since China carried out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fertility has dropped to below replacement level since 1992 when China directed the reform on establishing a market economy. While the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was initiated by the government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further drops in fertility in the 1990s are more a result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arket oriented reform and the subsequent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vide necessary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a stabilized low fertility in urban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nstitutional,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creat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ndividuals rationalize their fertility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s in stabilizing low fertility are changing from those that are policy dominated into the ones that are self controlled.

Keywords: Fertility Decision-making; Fertility Preferences; Fertility Demand.

Author: Li Jianmin is professor,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Nankai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